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

田海龙 张迈曾

(南开大学,天津 300134;天津商学院,天津 300134)

提 要:交际双方的地位不同,对话语的控制程度也不相同;话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构成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 Vološinov 将社会组织结构划分成直接情景和社会情景的论述,对话语学家 Austin, Searle, Thomas 和社会学家 Foucault, Bourdieu 关于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进行分析讨论,发现语用学从直接语境出发,视话语权力为个体行为,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对应规则和话语权力关系的永久不变;社会学从社会语境出发,视话语权力为机构行为,强调话语权力的隐蔽性和变化性。对比分析语用学和社会学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可更清晰地认识话语权力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话语;权力关系;语用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话语权力特征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6)02-0007-07

1 话语研究与话语权力

对话语的研究,有形式主义的,有功能主义的,还有社会的。Schiffirin 论述了前两种话语研究。他指出,形式主义的话语研究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的语言单位,与词素、小句一样同属语言的等级系统之中(Schiffirin 1994:24)。虽然这种研究试图摆脱西方主流语言学把语言作为封闭的抽象系统进行研究的束缚,把研究对象由“语言”转向“言语”,但其语言思想仍囿于形式主义的桎梏之中,对话语的研究也仅局限于话语的内部结构上,把话语的理想化形式作为研究的目标。功能主义的话语研究认为话语就是语言运用(Fasold 1990:65, Brown and Yule 1983:1)。这种研究摈弃了形式主义注重结构分析的方法,转向研究话语的模式、交际目的以及情景对意义的决定作用。与这两种话语研究不同,批评话语分析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话语,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Fairclough 1989, 1992, 1995;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这种话语分析将话语置于社会大环境之中,研究话语的产生和

对社会实践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折射社会现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因此,话语不仅成为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而且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社会机构、政党、新闻媒体都可以运用话语参与社会变革。

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这里所说的“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而是广义的由话语体现的,在日常交际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于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地位不同,对话语的控制程度也不同,故其所言之语的“分量”也不尽相同。换言之,参与者在运用话语进行交际时,相互之间的话语权力是不平衡的。处于主导地位的参与者主宰交际的发展;处于从属位置的参与者或认同现状,或试图抨击、反驳。由此可见,权力,亦称话语权力,构成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形式主义的话语研究,忽略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也就没有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功能主义或语用学的话语研究与社会学的话语研究,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而且深入到交际双方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和交际双方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等问题,但是,这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篇章批评性分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03BY024。

二者之间在语言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本文将通过分析语用学和社会学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研究,探讨这两种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研究的特点,以求清晰认识话语权力的本质。

2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语用学研究

人们在运用话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支配话语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对此,我们称之为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在下文中,我们选择 Austin (1962), Searle (1996) 和 Thomas (1985) 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讨论分析,以期归纳出语用学研究话语权力关系的一些特点。

2.1 Austin 的研究

Austin 对语用学的贡献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然而,他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区分言语行为 (Austin 1962)。起初,他试图区分述谓句和施事句,后来转向将言语行为分成表述性言语行为 (locutionary act, 说话本身)、施事性言语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与说话同时进行的做事)、成事性言语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 做事造成的结果)。言语行为三分说构成 Austin 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而其中的施事性言语行为 (简称施事行为) 又是其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即语力” (顾曰国 2002:F26)。Austin 继续将施事行为分为 5 种:评判行为 (verdictives)、施权行为 (exercitives)、承诺行为 (commissives)、表态行为 (behabitives) 和论理行为 (expositives)。Austin 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以英语的动词意义为标准。我们以施权行为为例说明他的分类标准。施权行为以言者的社会地位、身份为适切条件,表示实施权力,诸如任命、选举、命令、敦促、建议、警告等 (Austin 1962:151)。对施权行为的确认, Austin 与确认其它施事行为一样运用了动词标准,即以动词意义来判定施权行为。他列出的动词有 appoint, name, order, command, direct, sentence, fine, nominate, warn 等 (Austin 1962:156)。显然, Austin 对施事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动词意义的基础之上的。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已经涉及到言者以言行事的权力。但是,话语权力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被隐含在适切条件之中,并没有被充分阐释。而

且,适切条件也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条件,没有作为社会现象进行本质性的探讨,更没有将这些条件扩展到社会关系或机构权威。Austin 对权力关系研究的最典型特征在于他以动词词义为基础分类施事行为,从而将施事行为的力量建立在动词意义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言语行为的力量在 Austin 看来很大程度上要靠动词的意义来实现。所谓“语力”的“力”即在“语”之中,是语言本身的力量;虽然语力的实现需要一定的适切条件,但这种力量原本出自语言本身。由此看来, Austin 开创的言语行为理论虽然初步涉及到话语权力,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单一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纯粹语言或逻辑分析而已。

2.2 Searle 的研究

Searle 对 Austin 以动词词义为中心区分施事行为的研究提出批评,指出:即使是语言本义这种明显成份的交流也需要社会因素的帮助,而不是纯语言所能完成的 (Leezenberg 2002:896)。Searle 对语言运用的社会本质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对社会事实或他所称的“机构事实”的论述上。所谓“机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即伴随机构而产生的社会事实,如牧师传教或总统执政。他认为,语言系统或语言结构,可被系统分析成集体社会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漂浮在社会活动之上的抽象系统或结构。权力存在于机构事实以及语言的建构之中。机构事实的产生是其论述的关键。在他看来,机构事实的产生有三个基本成份 (Searle 1995):1) 集体意愿 每个人的意愿导向一个集体活动;2) 赋予功能 个人或集体意愿将物理或生理以外的功能赋予个体;3) 建构规则 “X 在情景 C 中被认为 Y”,当功能赋予机构化时该规则出现。机构事实产生之时,集体意愿也就赋予个体以地位功能或权力,使其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Searle 对机构事实产生的分析表明,他认为以言行事并非像 Austin 分析的那样,仅仅建立在与词义相关的“语力”上。根据 Searle 的分析,以言行事要产生效力,相关的个人就要有一个集体的意愿,并将这个意愿的功能赋予一个个体;这时,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就会产生社会事实,言语就会产生效力,个人就会实施权力。这里, Searle 强调两点:权力是个人财产;权力须要公认。一个人说 I name this ship Elizabeth 并以此行事,他除了需

要借助语言词汇之外,还需要集体意愿赋予其权力,并由集体认可这种赋予。

Searle 关于“权力是个人财产并须要公认”的说法构成他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的内容。在他看来,权力本身就是合法化,是意见一致的结果。机构事实之所以是事实,是因为它们被相信是事实。一个人有管理国家的地位功能或权力是因为人们相信他有这样的权力,即人们接受他的这种作法。在此基础上,Searle 提出,大家同意将一种地位功能赋予一个个体时,机构事实便可产生;语言是机构事实的一种,语言具有权力也是因为语言使用者都同意某个语言使用者以言行事。在这里,话语权力的个人特征被突出显现出来。事实上,Searle 对话语权力的论述也非常强调个体的作用。

2.3 Thomas 的研究

Thomas 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不再像 Austin 和 Searle 那样只研究单一话语的权力,而是扩展到研究话语的组织模式,研究交际过程中的话语权力。Thomas (1985) 研究了 4 种不平等情景中的话语权力问题:警察局主检查官对被指控的侦探,法官对被告,导师对博士生,校长对逃学的学生。在这些不平等的情景中,话语参与者的角色关系界定十分清楚,其话语权力的大小也十分明显。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参与者在这些不平等情景中所使用的语用策略成为 Thomas 关注的重点。Thomas 归纳出三种语用策略:1) 言外之力的表达方法(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2) 元语用评论(metapragmatic comment)、总结和重述(upshots and reformulation);3) 利用合适条件。我们用“总结和重述”来说明 Thomas 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研究。

(警察局主检查官对被指控的侦探)

Constable: (*makes very long complaint about what the Inspector has said*) . . . and I'm afraid sir I'm just absolutely staggered.

Inspector: yeah well yes well what you're basically saying is that um . . . all these people are wrong but Barry you are right.

Constable: no you know I can't take them on sir.
(*Thomas 1985:775*)

在这一段对话中,检查官在被指控的侦探抱

怨许久之后,对他的抱怨作出一个“总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错了,只有你贝瑞是对的”。迫于主检察官身份的压力,被指控的侦探只好后退,否定自己原先的说法：“不,您知道,先生,我不能指责他们”。

(被告被指控拒捕并击打警察。他承认打了警察,但后来在法庭上称警察先打了他。)

Court Official: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Defendant: (Silence)

Court Official: Did you do it or not?

Defendant: Well, I did hit him, yes.

Court Official: So that's "guilty" then.

Defendant: Yes, sir. (*Thomas 1985:774*)

在这一段对话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官明白无误地“重述”听者的话,即“用自己的话表达听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是有罪了”。面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官如此“重述”自己的意思,被告只好确认他的话语意图,承认自己有罪。

2.4 语用学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Austin 及 Searle 对言语行为的研究所涉及的话语权力,以及 Thomas 对“不平等交际(unequal encounter)”中话语权力的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强调权力的个体性 Vološinov (1973:86) 把社会组织分成直接情景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而 Fairclough (1989) 则把社会组织结构划分成三个层面:社会情景、社会机构和社会整体。Fairclough 的“社会情景”是话语发生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Fairclough 1989:25),与 Vološinov 的“直接情景”所指一样,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课堂、医生对患者的诊所以及法庭等存在等级差异的场景。Austin 命名船只的仪式和 Thomas 的法官对被告的讯问,都属于这种直接情景。语用学的话语权力研究所观察的话语权力的运作往往以这些直接情景为背景,所关注的也仅是这种直接社会情景中的话语交流。虽然这些直接情景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等级制度的机构情景,而且一方对谈话的控制被清楚地认定为权力的一种形式(Philip 1998:212),然而,语用学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仅仅局限在直接语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多地强调个人在话语权力运作中的作用。

语用学对话语权力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情景”层面,视话语权力为纯粹的个人行为,只是涉及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表层。语用学这种表层的话语权力关系研究降低了话语权力研究的意义。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情景”层面,在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中,话语参与者的上下级隶属的权力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批评的角度看,分析的意义并不在于归纳明显存在的话语权力,而在于显现那些习以为常、隐晦难解的权力关系。只有这样,话语权力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2) 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对应规则 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语用学研究试图归纳出一些语言表达方式的规则。言语行为理论归纳出各种言语行为用语;Thomas 也归纳出三种不平等情景中话语权力的表达策略:语力的表达方法,元语用评论,总结和重述,利用合适条件。如此归纳与分类似乎表明应用这些规则就可以确立起语言结构与交际目的之间的固定关系,正如 Thomas (1985) 确信的那样,“正因为有权力的言者知道元语用行为将发挥作用,他们才这么系统地应用它们”。但是,这种对规则和语言形式的强调世袭了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和会话分析理论的衣钵 (Philip 1998:212),将语言形式与交际目的视为一种对应不变的规则。用这种方法研究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就会对话语权力的变化性视而不见,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只要运用一种事先准备好的规则就能保持在话语交际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3) 强调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永久不变 Thomas 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在言语交际中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以及言语交际应遵循的机构规范对交际的进行和话语的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1985:766),这相对于只注重会话结构的会话分析理论来讲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她用来阐明观点的交际实例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法院、学校、警察局)。在这种机构中,权力、社会距离和权力作用的程度等语用参数都相对地被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机构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泾渭分明,交际者之间的权力差别及社会距离是巨大的。Thomas 只注重描写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参与者所使用的策略,并相信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保证他们保持这种主导地位 (Thomas 1985:767),这反映出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语用学

研究存在一个不足:有权力一方在交际中的主导地位是永久不变的。Austin, Searle 以及 Thomas 对话语权力关系语用学性质的研究,都集中在处于交际主导地位的一方,总结他们保持自己主导地位所采用的各种策略或手段。这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为在社会情景中研究话语权力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3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社会学研究

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除了语用学性质的研究之外,还有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们选择 Foucault, Bourdieu 的研究进行讨论分析,进而观察其话语权力关系研究的特点。

3.1 Foucault 的研究

Foucault 将话语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来分析,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要受到一些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及再分配”(Foucault 1984:109),并提出了话语秩序的概念。所谓话语秩序是指一整套有序的语篇生成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限界和关系。这些实践活动与某个具体的社会领域或机构(如学术机构中的讲课、研讨班、咨询、非正式场合的交谈等)密切相关。“话语秩序是在话语层面表现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语上的历史印记”(Fairclough 1995:10)。具体的话语受潜在的常规惯例约束,这些常规惯例是相互联系的组合,包括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其总和成为话语秩序。

Foucault 对话语的分析分为两部分:批评的和谱系的。批评分析利用反向原则,把握排斥、限制和挪用的形式,展示它们如何应需而成形,怎样被修正和置换,以及实施了怎样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被规避 (Foucault 1984:130)。作为控制和限定话语的一种程序,排斥是在话语外部起作用、关乎权力和意欲的控制程序 (Foucault 1984:113)。这里, Foucault 分析了三种排斥系统:禁律、区别和鄙弃、真理和谬误之对立,旨在说明话语的禁止、理性与疯狂的区分和需要机构支持和分布的真理意志。他用古老的希腊原则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Foucault 1984:113):民主城邦尽可教授数学,因其教导的是平等的关系,然而在寡头政治中却唯几何可教,因其展示的是不平等下的比例。

除了“排斥”这一话语外部程序之外, Foucault

还分析了话语内部或话语自身的控制程序,这些程序实为一些分类、调整、分布原则,关乎对话语偶然因素的掌控以求话语的洗炼,包括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评论原则对话语中偶然因素的限制是采取了重复和相同的形式,而作者原则是通过个性和自我的形式加以限制。学科原则不同,它是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其形式则是对学科法则永无休止地阐明。Foucault 指出,这三个原则形成了话语创造的无限的泉源,然而它们也同时具有对话语的限制功能,强调:“如果不考虑它们的禁锢和限制功能,我们很可能无法解释其积极和多样的作用”(Foucault 1984:120)。

第三组限制话语的规则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即对言语主体(speaking subjects)的限制和选择。不是所有话语领域都是同样开放和准入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Foucault 对言语主体限制的分析与他对教育体制的态度不可分离,他把教育视为社会个人对各种话语准入的手段。教育体制“无非是对言语的仪式化,无非是言语主体的一种资历及其角色的固定,无非是在形成具有某种信条的群体(无论是如何),无非是在分配和占有蕴涵知识和力量的话语”(Foucault 1984:123)。

Foucault 关于话语秩序的论述,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网络中的一种,与其它社会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由各种机构的权力关系构成。一个话语秩序就是在社会等级中形成的话语实践,它构成诸如政治、媒体或教育这些社会领域中社会秩序的话语端口(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114)。话语的控制程序,无论是话语外部的排斥还是内部的控制,抑或是言语主体的规则,都使得话语实践受到限制。人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力,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什么。由于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领域、机构的关系中间发挥作用,并在其之间不断地易主,结果形成“权力不被任何人拥有,也不属于任何人”(Danaher, et al. 2000:70)的局面。

3.2 Bourdieu 的研究

Bourdieu(1991)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习性(habitus)与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的论述。象征权力并非某种特别的权力,而是指惯常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是隐形的,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中呈象征形式存在。为此,它被赋予或被公认具有合法性。它是一种通过言语能构成既定现状的权力,一种使人承认并相信的权力,一种对世界看法的认可或改变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可以使人获得用武力或经济实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Bourdieu 1991:170)。象征权力之所以能够维持或破坏社会秩序,赋予话语或标语以权力(力量),正是由于人们确信话语和发话人的合法性,而要取得这种信任,前提是发话人要有资本。所以,获得资本就成了拥有权力的必由之路。资本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被赋予资本的多少及其构成决定占有某种地位的人的行为方式。如此这般,资本就变成了权力,而资本的各种形式一旦被认为具有权力的效果就成了“象征资本”,象征资本是象征权力的基础。Bourdieu(1991:170)认为,象征权力只有在被承认,也即被认为武断的情况下才可实施。

Bourdieu(1991)在发展其实践理论中详细阐述了“习性”(habitus)这一核心概念。“习性”即一系列习惯性的构架,使人们的行为及对事物的反应带有倾向性。这种习性能生成各种习惯的但又不受任何规则支配的实践活动、感性知识及观点态度。这些习性经过灌输、构架,具有耐久性、再生性和传承性。人们习性习得的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具有等级分明的特点,这也将习性中得以反映。例如,话语或表达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在一定环境中学习语言形成的习性,这些语言习性既可控制一个人以后相应的语言实践,又可控制对语言产品在其它领域或市场被接受的价值预测。领域或市场,是资本分配所造成的有等级之分的、彼此联系的地位网络,如教育机构或政治制度。在这个网络中,不同习性的人处于不同的权力关系之中。

Bourdieu(1977)曾经将象征性权力和象征性资本等社会学中的概念与语言学中的概念进行对比。与语言系统或语法性相对,Bourdieu 提出接受性的概念,即与情景想匹配、为大家所认可的语言。在语言交际方面,Bourdieu 提出用象征性权力关系取而代之,即用话语的权力和价值代替话

语的意义概念。针对传统语言学中的语言能力概念,Bourdieu 提出用象征性资本来代替,因为言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语言能力。由此可见,Bourdieu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特点。

3.3 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对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不仅仅是 Foucault 和 Bourdieu,但仅从 Foucault 和 Bourdieu 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也可以看到话语权力在社会情景中运作的下面几个特点。

1) 话语权力具有机构的特性 与语用学研究视话语权力为个体行为不同,社会学研究认为话语权力是机构行为。机构并非一个特定的组织,如家庭或工厂,而是一套相对持久的、赋予个人以权力、地位和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机构赋予言者以权威来实施其话语宣称实施的行为(Bourdieu 1991: 8)。例如,法官以“我发现你有罪”这一话语来实施其宣判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是法官,而是因为有一套人员和机构来保证他的宣判可以实施。至此,对于个别行为主体及其言语之所以能够拥有权力的条件而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取代了对于实现话语施事能力的具体语言规则的探究。Bourdieu(1991: 75)认为,行为言语魔力的真正源泉在于(法官)职位的神秘力量,依靠这种委派的职务,个人(无论是国王还是牧师或发言人)被授权代表一个群体发言和行事。如此,其本人也就构筑并归属了这个群体。

Vološinov 在谈及符号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时,也强调机构的必要性。他指出,意识形态真正存在于人所创造的特殊的、社会的符号材料之中。这些符号材料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们存在于有组织的个人之间。他进一步总结道,“二者的社会组织、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社会单位),事关重要。只有这时符号媒介才能在二者之间形成”(Vološinov 1973: 12)。Vološinov 这里所强调的正是符号的意识形态交流与话语权力的实施,只有在个人代表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中被赋予特定地位时,才能有效地进行。

2) 话语权力具有隐蔽的特性 在言语交际中,由于权力的实施与话语参与者所处的主导地位相关,而主导地位又是其社会地位和与之相关

的机构赋予的,所以话语权力又具有隐蔽性,以象征性的形式行使支配的职能。而且,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者往往相信其权力及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从而使权力得以成功实施。而且,话语权力的这种隐蔽特征还表现在权力的无处不在。权力与话语形影不离,只要有话语,权力就发挥作用,它调节、限制、规范话语实践,而且权力的这些作用正在背离明显标识的倾向,向越来越隐蔽的方向发展。

3) 话语权力具有变化的特性 话语权力,在 Bourdieu 的论述中是象征性权力。这种权力的获得要受到许多限制。Foucault 论述了话语的控制程序,无论是话语外部的排斥还是内部的控制,抑或是言语主体的规则,都使得话语实践受到限制,以致于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拥有话语权力。拥有话语权力的人试图永久占有它;没有话语权力的人也试图拥有它。拥有话语权力首先要拥有分配不均的文化资本。根据 Foucault 的观点,知识就是权力(力量),拥有知识就拥有了权力。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个人成功的象征,它们不仅是进入某个领域的通行证,而且也成为排斥别人进入该领域的手段。同时,不占有知识的人总是努力占有知识。结果,在争夺文化资本上总是存在斗争,权力关系也总是处于变化和不确定状态之中。

4 结束语

讨论分析语用学和社会学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发现语用学侧重研究直接情景中的话语权力关系,而社会学侧重研究社会情景中的话语权力关系。这一研究角度的不同,导致语用学视话语权力为个体行为,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对应规则和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永久不变;而社会学视话语权力为机构行为,强调话语权力的隐蔽性和变化性。语用学和社会学对话语权力关系的不同认识,其根源在于语用学认为社会是和谐的,社会活动是理想状态下人的交际活动;社会学则认为社会是冲突的,社会活动是现实中人的交际活动。然而,无论是在直接情景的微观层面还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言语交际的参与者之间的等级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话语权力的不平等也是伴随话语实践无处不在的,所以语用学和社会学对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都是有价

值的。然而,如果二者结合起来,在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的联系,“将个人与社会、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个人思想和经历与包括权力在内的集团态度和集团关系联系起来”(van

Dijk 1993),我们就会认识到:话语不仅成为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成为权力斗争的手段;话语权力不仅是一种限制力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创造力量。

参考文献

-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62].
- Bourdieu, P.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97 (6): 645—668.
-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Danaher, G., Schirato, T. & Webb, J. Understanding Foucault [M]. London: Sage, 2000.
-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9.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lackwell, 2000 [1990].
-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Discourse [A]. In M. 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108—138.
- Leezenberg, M. Power in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emantics - Pragmatics Interfa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34): 893—908.
- Philips, S. Language Ideology in Institutions of Power: A Commentary [A]. In B. B. Schieffelin et al. (Eds.)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1—229.
- Schieffelin, B. B., Woolard, K. A. and Kroskrity, P. V.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chiffirin, 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Searle, J.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M].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
- Thomas, J. The Language of Power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5 (9): 765—783.
- Van Dijk, T. A.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Discourse & Society, 1993 (2): 249—283.
- Vološ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Y and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3.
- 顾曰国,《如何以言行事》导读 [A],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2005 - 05 - 26

【责任编辑 李洪儒】

Xin Bin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CDA, Titscher et al (2000) points out that "Michel Foucault has also been a major influence on some exponents" of CDA, including Norman Fairclough (p. 144). This paper intends to give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to Foucault's conception of power and its intrinsic relatedness to knowledge, discourse and truth. In so doing, we hope to show that though Foucault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DA'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ome of the most basic concepts such as "power, truth and discourse". **Key words:** power; discourse; critical analysis

Tian Hailong Zhang Maizeng Pragmatic and Societal Approaches to the Asymmetry of Power

Asymmetry of power between agent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constitutes a key topic in discourse stud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wer relationship in discourse are varied in perspectives. Drawing upon Vološinov's classific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to immediate situation and social milieu,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pragmatic approach that sees power relationship as individual, linguistic and unchangeable and societal approach that sees it as institutional, covert and changeable. The overview of the micro-pragmatic approach and the macro-societal approach to power is expected to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eatures of power.

Key words: discourse; asymmetry of power; pragmatic approach; societal approach; features of discourse power

Zhan Quanwa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At present, discourse analysis lacks clear goal, an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system or any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present author holds tha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researchers of discourse analysis don'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in task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Key words: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social constructivist view; discourse analysis; reality

Qian Guanlian Conjecture on Speechology

This thesis, first of all, traces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in the field concerned. The focus of the work is on a conjecture on speechology in terms of its research object, the key terms, its nature, and its research methods. Then, the author puts a recent report on the current pulse of speechology abroad: Speechology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as a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Finally, the thesis proposes a major avenue of thought of how to establish speechology.

Key words: speechology; research object; key terms; research methods

Wang Zhengyuan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discourse marke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iscourse markers within coherence and relevance theory and from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lanes, this paper analyses several issues on the differences of discourse markers and pragmatic markers, their semantic meaning and pragmatic meaning, propositional meaning, procedural and conceptual meaning.

Key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coherence; meaning; pragmatics

Gu Qiyi Reflections upon Output Hypothesis

Swain's Output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output can facilitate L2 accuracy because of three functions: noticing/triggering, hypothesis testing and metalinguistic reflection. When Gass'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model is adopted as a framework, the three functions are found to serve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with different cognitive and knowledge resources.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unique to output, and cannot benefit SLA without input.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functions does not equal acquisition. Only when SLA is clearly and operationally defined can the role of output be verifi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put process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should undergo restructuring and proceduralization after intake and integration. But so far, the loci of output in restructuring and proceduraliz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s only theoretically hypothesized, which requires future empirical verification.

Key words: Output Hypothesis; linguistic competence; restructuring; proceduralization